

华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魏晓冉¹, 倪 凯²

(1.聊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2.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华岗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华岗作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 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 有力推动了论战的进行。华岗的革命史研究始终关照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 贯彻了党的革命理念, 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与革命史叙事范式的建构。华岗深刻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构建, 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相接合, 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论。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 中国革命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4-0104-10

收稿日期: 2026-05-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S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

作者简介: 1.魏晓冉(1988-), 女, 山东莱芜人,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2.倪 凯(1991-), 男, 山东临朐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4.005

一、华岗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

20 世纪前期, 中国的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表现是进化史观的引入。进化论的传播突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守旧性与封建性, 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石, 并且成为榘接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的先导。^① 进化论同史学相结合, 开始于梁启超的《新史学》。1902 年, 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分期发表文章《新史学》, 批判旧史学, 倡导“史界革命”, 以民史代替君史, 主张历史是研究进化之现象的学问。^②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的第二个表现是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研究, 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 可以追溯到 1919 年五四运动,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③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和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涌现了李大钊、蔡和森、李达、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邓中夏、华岗、李平心、何干之等一大批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 最早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④ 1919 至 1920 年, 李大钊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 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⑤ 1924 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学科体系的奠基之作。^⑥ 1930 年郭沫若出版的《中国古代

① 彭卫、杨艳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三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4 页; 陈卫平:《中国近代的进化论与政治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6 期。

② 梁启超:《新史学二》, 《新民丛报》1902 年第 3 号, 第 57-64 页。

③ 李红岩:《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概说》, 《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左玉河:《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河北学刊》2013 年第 3 期。

⑤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5 期;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 《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6 期;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见《史学要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第 188-194 页。

⑥ 彭卫、杨艳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三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71-95 页。

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可以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形成的标志。^① 华岗是与郭沫若同代的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华岗出版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国将何去何从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崛起。^② 华岗作为大革命的幸存者,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华岗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一名学者,他的历史研究总是跟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华岗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大革命的幸存者,为了纪念死难烈士,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华岗在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决心将这段悲壮的革命历史记录下来。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序中,华岗写道:“我最起初起意编著这部中国大革命史,正是广州暴动失败不久的时候,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那时我便着手写了一个大纲,同时即开始搜集材料。”^③ 大革命失败后,华岗的很多革命战友慷慨就义。在自序的最后华岗满含深情的写道: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④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各派势力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集中讨论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⑤ 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决议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追随陈独秀支持托洛茨基观点的“托陈取消派”(动力派)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新生命派)否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面对新生命派和动力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以及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否定,支持中共六大决议案的学者,以《新思潮》为阵地展开反击。^⑥ 华岗作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同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1928年,华岗作为团中央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回国后华岗积极宣传贯彻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指示。^⑦ 华岗撰写大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驳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的自序中,华岗写道:“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中国机会主义者结合成取消派,一致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们——特别是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不但不愿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推翻历史的事实。因此,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便又鼓励了我编著这部革命史的勇气……”^⑧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华岗着手开始书写大革命史,1930年完成初稿,1931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在上海春耕书店出版。这本书“阐述了自鸦片战争时期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史,

①左玉河:《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蒋大椿:《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

②左玉河:《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③华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自序。

④华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自序。

⑤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论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⑥李红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卢毅:《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⑦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97页。

⑧华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自序。

初步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①，是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书中华岗使用了大量的史料与数据^②，阐明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事实，并对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中国各阶级的状况以及阶级间的矛盾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中国大革命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但是革命的主力军却是无产阶级的结论。^③“由于华岗在论证和阐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和前途，都从实际出发，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鲜明的观点，此书被当时全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论战的人们，视为是‘对中国史研究极有价值的著作’，直接推动了这场论战。”^④

华岗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出版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时期。华岗虽未撰文直接参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但是华岗撰写《中国大革命史》的目的之一是批驳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坚持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同新思潮派的观点一致，并且《中国大革命史》在当时流传广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有力组成部分。1931年4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创刊，开启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王礼锡认为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王礼锡、路晶清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徐松焘给《读书杂志》写信，与王礼锡就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在信中他写道：“我相信王礼锡先生所开书目一定还遗漏掉许多重要的书报，就我已看到的来说，今年七月份春耕书局所出版华岗先生编著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与九月间新生命书局所出朱其华先生所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两书，都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极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华岗先生所著‘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洋洋三十万言，更可说是中国社会史书籍中第一部巨制，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华岗先生之论断，有些我就很难同意，但是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材料却异常丰富，而且他也提出很多新的见解，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时极重要的著作。”^⑤王礼锡回信时对《中国大革命史》的重要作用予以肯定，他写道：“华岗先生所著的‘一九二五至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在前日才由不知谁何寄来，是用中共干部派的观点写的，分订三册，洋洋三十万言，真算目前一部巨著。”^⑥

1932年，华岗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在董必武的要求下华岗才得以释放。^⑦自1932至1937年华岗未发表任何文章，是华岗学术缺失的5年。1937年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华岗出狱后的著作《社会发展史纲》（1939）、《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1939）讨论了社会史论战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华岗在狱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关注与思考。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华岗在《社会发展史纲》中，批判了马札亚尔派的观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前夜，也不同意郭沫若氏族社会解体后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华岗基本支持了朴列汉诺夫的观点，即氏族社会解体后人类向着两个可能的方向发展，一个是亚细亚的，一个是古代的。华岗认为亚细亚生产方

① 蒋大椿：《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

② 这些史料有原始档案材料、书籍、报纸等，数据多是从当时报纸（上海总商会出版的《商业月报》、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中国年鉴》《中国劳动年鉴》《工人旬报》《申报》）上刊登的新闻以及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获得。

③ 华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5-51页。

④ 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⑤ 《中国社会史论战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4-5页，转引自王礼锡、陆晶清编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二辑，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508-509页。

⑥ 《中国社会史论战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6页，转引自王礼锡、陆晶清编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二辑，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510页。

⑦ 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132-133页。

法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社会构成,即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时代之东方奴隶制的变种。^①关于奴隶社会问题,华岗对朴列汉诺夫、马札亚尔以及陶希圣、李季的奴隶社会空白论持否定态度,支持科瓦列夫、莱哈尔德、相川春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等人的“奴隶制是普遍存在”的观点。华岗认为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奴隶社会在不同的社会有其特殊性,曾经存在过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的、殖民地的各种具体形态。^②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华岗批驳了陶希圣“中国自秦至清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他认为商业资本不能代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阶段……商业资本不能代表一种生产方法。它的作用,只担负商品的交换关系。它的存在条件,只要有货币与商品流通所必需的条件存在。只要具备这一交换的条件,无论在奴隶制、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制的生产基础上,商业资本都可以存在。^③

二、华岗是中国近代史与革命史叙事的开拓者

华岗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之一。华岗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33)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时期最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著作。^④华岗撰写《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寻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为此,华岗研究了中国大革命的性质与动因以及大革命发生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而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然后华岗运用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过程,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最后,华岗对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和政策等进行全面总结,深入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⑤华岗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中国革命史领域的拓荒之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典范,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史的研究体系,具有开拓意义。^⑥继1931年出版《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后,1940年华岗出版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是华岗撰写的另一部革命史著作,确立了华岗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奠基者的学术地位。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民族解放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在延安等地开展起来,出版了多部中国革命史著作,其中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影响较大,不仅在解放区广泛发行,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流行,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⑦

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的基础上改编扩充而来。该书原计划出版三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第一卷,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史为第二卷,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三卷。1940年上海鸡鸣书店出版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第一、二卷,第三卷的写作华岗并未完成。^⑧《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延续了华岗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著述的理念,撰写本书的目的“是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解放的史实给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

①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25-29页。

②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30-33页。

③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33-36页。

④蒋大椿:《八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00-225页。

⑤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5-376页。

⑥王学典、黄广友:《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王记录:《论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孙宜山:《革命语境下的求真探索——华岗史学思想及成就综论》,《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

⑦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0页。

⑧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自序〉第1页。

这些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①中国的社会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担负起了进行社会革命、民族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华岗作为一名党员,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线。华岗坚持“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②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正确断定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反帝)与社会解放(反封建)不能分离,中国一百年来民族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③华岗构建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经由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再到大革命(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五卅运动)的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叙事脉络。这一叙事脉络基本确立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书写的研究体系,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论述的内容一致。^④华岗认为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预示着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⑤华岗以五四运动为界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这同毛泽东关于新旧民主主义运动的分期基本一致,^⑥由于毛泽东“两个过程”的理论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因而后来的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书写基本沿用了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叙事框架。^⑦建国前后,华岗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两部革命专史著作,进一步夯实了他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这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者被译成俄文出版,后者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统论述五四运动的专史。^⑧

华岗的革命史研究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而中国的革命实践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强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⑨此后世界革命逐渐发展为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相结合的革命运动。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早期领导人深受共产国际革命理论的影响,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⑩华岗的革命史书写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将中国大革命看做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华岗革命史书写的一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华岗的革命理想。华岗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都最少用一章的篇幅交待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世界历史背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华岗声称,中国大革命更可说含有极大世界历史意义的殖民地半殖民解放运动的代表,是世界革命主要组成部分之一。^⑪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华岗写道:“中国大革命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着最重要的一页,而且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大革命推动了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

①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 (自序)第2页。

②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1页。

③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 (自序)第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⑤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第250-25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672页。

⑦孙宜山:《革命语境下的求真探索——华岗史学思想及成就综论》,《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

⑧向阳:《丹心可鉴:华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2页。

⑨《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7-218页。

⑩李永春、罗雄:《东方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演变(1919—1924)》,《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4期;刘海军:《中国共产党对“世界革命”的认知及其特点(1921—1927)》,《苏区研究》2022年第1期。

⑪《华岗选集》编委会选编:《华岗选集》第一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动,同时大革命也说明了中国革命是破坏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①

三、华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构建的推动者

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为一大批史学著作的出版,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经过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战后,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历史研究中,对判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分期的划分、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刻的阐释。1938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进行系统且正确地阐释,澄清当时正在传播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②这一时期,华岗也展开了对史学理论的探索,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1939)虽然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他还撰写了《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1939)、《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1940)、《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1940)、《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1940)、《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1942)、《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史学理论文章。^③1946年华岗将其《论中国历史的翻案》(未公开发表)与已发表的《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整理为《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出版发行。^④《中国历史的翻案》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与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之后,又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著作。

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两部分。就历史理论而言,华岗充分阐释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第一,华岗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为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的发展动力以及历史认识的确定性四个方面。华岗在阐释唯物史观时,明确的将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历史知识区分了开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一文中,华岗明确指出:“物质世界即社会物质生活是离开人们意志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意识乃是这个客观现实的反映,即存在的反映。”^⑤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华岗更是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性,来自于人类的实践活动。^⑥第二,华岗阐释了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以及历史的阶段性演进原理。在《社会发展史纲》《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以及《中国历史的翻案》中,华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华岗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遵循辩证演进的法则,要研究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华岗在1939年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纲》中指出,人类历史是一种往前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屡屡以飞跃及辗转而前进,历史发展的法则是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⑦在1940年发表的《恩格斯在历史

①《华岗选集》编委会选编:《华岗选集》第一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2页。

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序)第7页。

③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化冈:《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9期;化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学习生活》1940年第2卷第1期;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续)》,《群众》1942年第7卷第15期。

④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作者自序)第1页。

⑤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⑥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⑦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自序)第1-3页。

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一文中，华岗指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发展也和世界一切东西的发展一样，是因为它内部包含着矛盾。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全部发展阶段列为先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顺次发展的阶段，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行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形态之统一，指出历史过程的统一与联结，发现历史发展之一般的正确的法则。^① 第三，华岗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华岗在《社会发展史纲》中指出，阶级任务的实践构成了历史本身运动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② 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中，华岗指出生产方法决定社会性质。生产方法又是包含着社会生产力及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使社会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③

华岗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指导地位，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相接合，形成了华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理解。华岗认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是科学。在《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一文中，华岗指出，社会历史真正成为科学是马克思的功绩。^④ 在《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一文中，华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发展真实法则，形成唯物史观的学说以后，历史才成为真正的科学。^⑤ 华岗认为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需要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上的指导地位，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华岗在《社会发展史纲》中写道：“社会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实践生活及其发展过程，特别是研究生产规律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科学。”^⑥ 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中，华岗指出，要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⑦ 华岗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⑧ 由此，华岗提出了如何研究信史的问题。华岗指出，古代历史失实的原因主要是史官的阶级局限，“过去史籍，大部都是帝王家谱，写历史的人，大多是帝王御用的史官，囿于他们的阶级意识，即使秉笔直书，也会歪曲了真正的事实”^⑨。华岗提出建设信史的前提，是要“重新搜索史料，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厘革，对伪造的历史和被曲解的历史进行翻案”，“然后尽可能的据有各种史料，并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⑩ 那么如何建设信史呢？华岗认为建设信史，要做到科学的立场与方法的统一，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研究历史，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采用考证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辨伪分析。^⑪

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始终关照中国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方向。在《社会发展史纲》的自序中，华岗写道：“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⑫ 华岗阐释

① 化冈：《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9期。

②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4-10页。

③ 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④ 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续）》，《群众》1942年第7卷第15期。

⑤ 化冈：《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上的建树——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与介绍》，《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9期。

⑥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4-10页。

⑦ 化冈：《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卷第2期。

⑧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5页。

⑨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15页。

⑩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17-18页。

⑪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22-38页。

⑫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自序）第1页。

了研究中国历史与抗战的关系。华岗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一文中写道：“我们抗战建国中的一切方针和策略，都要根据历史做决定，依照历史做指南。当前一切问题，从军事斗争到建立民族文化，都只有历史给予的正确解答，才能指示我们实践的方向。”^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中，华岗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时，总是用中华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作为例证，试图用唯物史观为中国的革命与抗战提供理论依据。在论述掌握先进的新社会思想与理论的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时，华岗指出：“我们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唯一出路，凡是能够把握这一伟大的历史动向，努力推动抗战前进，并领导抗战得到胜利的个人与集团，便都是伟大人物与力量，将来在历史上也就有很光荣的地位。”^②在论证生产方法(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演变时，华岗指出劳动手段(工具与技术)是衡量社会诸关系的指标，不是决定因素，历史的发展以内部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外来力量起到的只是刺激和辅助作用。由此，华岗以中国近百年来的农民战争为例，指出：“每一次农民暴动都不是偶然的爆发的，而是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大众不堪残酷的封建剥削的时候，反对剥削的斗争……当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渐次形成而加强的时候，农民的革命就发展到更高的综合，成为解放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③在论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时”，华岗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指出：“从九一八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各种零星的救亡运动，终于汇合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解放战争，此时已有的量的发展进到质的变动。抗战发动以后，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更由质的变动，引起国内外形式的新变化，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着一个簇新的方向发展。”^④

华岗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关怀和历史使命感，还体现在对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批判上。1937年至1939年，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泽修二先后出版《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本书，企图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依据。秋泽修二的侵略史观与反动史观，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体批判，吕振羽、华岗、李达、吴泽等纷纷撰文批判秋泽修二的错误史观。其中，吕振羽与华岗是批判秋泽修二的主力。1940年，吕振羽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他们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秋泽修二的法西斯历史观展开了批判。^⑤吕振羽在《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指出，秋泽修二关于亚细亚停滞性问题的论断已经不是从研究的立场出发，而是为日本侵华提供辩护。^⑥华岗对秋泽修二的批判更具有斗争性，直指秋泽修二为日本侵华辩护的反动属性。在《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中，华岗写道：“敌寇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还故意曲解并伪造中国历史。例如业已摇身变成日本法西斯强盗代言人的秋泽修二，为着要曲说日寇之灭亡之中国之历史的必然，最近竟重新把亚细亚的社会作为问题提出……想从曲解中国社会发展形式，来无耻辩护它的侵略战争为‘圣战’。”^⑦在《社会发展史纲》中华岗指出，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泽修二等……伪造中国历史，说“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即“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而“日本这次进攻中国，正是为帮助中国扫除亚细亚停滞性的政治支柱”，来替日寇侵略主义作辩护。^⑧华岗在论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把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作为例证，对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进行地有力批判，显示了他

① 化冈：《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卷第2期。

② 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③ 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④ 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⑤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1期；吕振羽：《“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华岗：《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

⑥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1期。

⑦ 华岗：《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

⑧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26页。

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目的就在于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认识过去是为了找到“造成现在国难的历史根源,把他们连根拔去”。华岗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写道:“坚持了三年以上艰苦抗战的中国,究竟要奔到那里去,要正确地把握这个问题,当然要注意‘现在’,但是也不能忽视‘过去’,因为它正是‘现在’的生母。一切事物都是从‘过去’发展而来”,再向未来发展而去。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历史,正是为要明确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①

结 语

华岗作为中国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的近现代史著作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的书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是当时比较系统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全人类视野的通史著作。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部奠基之作。建国初期,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被改编为《中国近代史》作为高二以及专科学校的教材,在高中与专科学校被广泛使用。^② 华岗版《中国近代史》的章节框架,影响到了后续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纂。有学者认为,“至今有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未超出华、范二书多少”^③。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是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太平天国运动、五四运动的专史著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华岗的革命史叙事具有世界历史的大视野,这在中国革命史书写中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涵。华岗建国后出版的哲学、美学著作《辩证唯物论大纲》《规律论》以及美学著作《美学论要》,提供了诸多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例如,华岗在《美学论要》中指出,美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④ 充分肯定了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华岗的史学研究 with 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革命年代,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华岗撰写《中国大革命史》,是为了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大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帮助推动中国革命“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⑤ 华岗撰写《社会发展史纲》,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各国人民大众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在帝国主义强盗正在进行大屠杀与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非常时代,让人们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知道许多先进人类的奋斗经验和教训,来帮助我们挣脱苦难以争取解放自由。^⑥ 华岗撰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目的,是理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民族解放的历史脉络,指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华岗认为:“中国人民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也为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抗战,也已经进行了两年以上。这次抗战不仅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史上最伟大的一次。”^⑦

^① 化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学习生活》1940年第2卷第1期。

^② 华岗:《中国近代史》(上册),邯郸: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1月;华岗:《中国近代史》,上海: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3月;华岗:《中国近代史》,沈阳:东北书店,1949年4月。

^③ 路遥:《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评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二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④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⑤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⑥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自序〉第1页。

^⑦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第33页。

“我们的任务异常艰苦，必须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配合客观的国内外有利情势，以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中途妥协的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坚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争取最后胜利。”^①

Hua Ga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EI Xiao-ran, NI Kai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Hua Gang i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China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ua Gang was a participant in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social history. He criticized the views of the schools of Trotsky and Chen Duxiu and strongly promoted the debate. Hua Gang's research on revolutionary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mplemented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s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y. Hua Gang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ory, combin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enriched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methodology.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bate of social n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责任编辑 如初]

^①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上海：鸡鸣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民国二十九年第一版），第39页。